

钱颖一 主编 比较译丛

内森·罗森堡 L. E. 小伯泽尔

Nathan Rosenberg & L.E. Birdzell, Jr.

曾刚◎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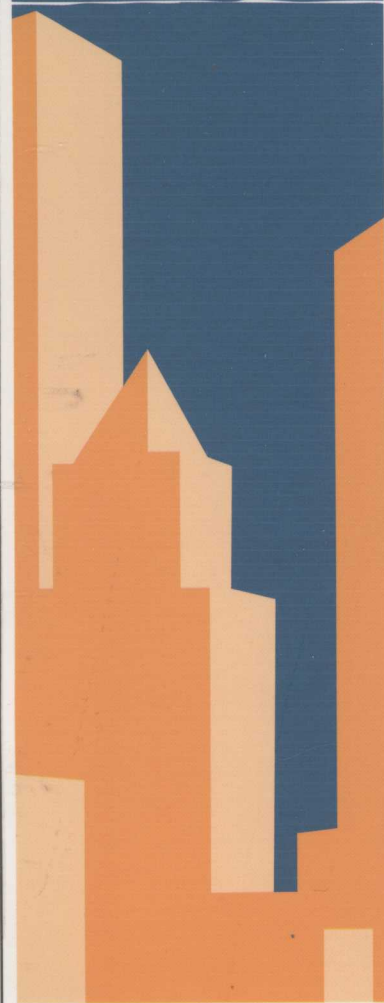
西方现代社会 的经济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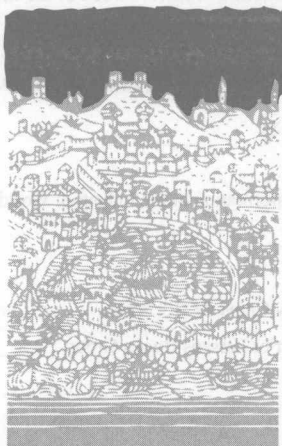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西方现代社会的 经济变迁

[美] 内森·罗森堡 L. E. 小伯泽尔◎著
曾刚◎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 / (美) 罗森堡, (美) 小伯泽尔著; 曾刚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6
书名原文: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ISBN 978-7-5086-1482-3

I. 西… II. ① 罗… ② 小… ③ 曾… III. 经济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3439 号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by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Copyright © 1986 by Basic Books, Inc.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

XIFANG XIANDAI SHEHUI DE JINGJI BIANQIAN

著 者: [美] 内森·罗森堡 L. E. 小伯泽尔

译 者: 曾 刚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4395

书 号: ISBN 978-7-5086-1482-3 / F · 157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序

在今天，要写一部资本主义制度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工作，因其内容几乎尽人皆知：自由市场、私有制、货币、银行存款、保险、汇票、自由创业等。不过，要写一部西方国家兴盛的历史却相对很难，这是因为，在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兴盛的问题上，不同的人总是有不同的解释，歧见百出，难有定论。在这点上，生物学家的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生物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自然的演进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生物体系，小到蛋白质分子，大到沼泽地的生态系统。这些系统精巧、复杂，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畴。或许，一如自然的演进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系统的演变同样有偶然性、试验性，不能为人所设计和左右，并有自己的生存标准。不管怎样，生物学提醒我们：对于西方如何兴盛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不要期望会有一个现成的解释。

在开始论述西方经济增长史并厘清成就其增长的各种原因之前，我们要提出几个初步的观点：第一，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各国政府在19世纪初所起的作用。第二，组织管理对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等级制度并非组织管理的唯一形式。第三，本书中的“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以“主义”结尾的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称谓，所指的都是现代西方所采用的具有尝试性的、实用主义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所涉及的政策和实践与教科书中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大相径庭。

经济增长的非经济源泉和影响

西方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发展过程，曾得益于众多非经济因素，当然，反过来，也对诸多非经济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篇有关经济史的文章中，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以西方的价值观（即对生命的重视）来衡量，富裕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人口方面——由于死亡率下降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人口总量大幅度增长。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推进了西方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即从中世纪以乡村为主的社会演变为现代西方的城市社会。在一个人们不单靠面包生活的世界中，如果非经济部门不能迅速适应急剧的社会变化，要完成如此庞大的社会重组进程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政治制度在西方致富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制造业和贸易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行为具有一定自主性，不太受政治及宗教的约束。这与14世纪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放任。事实上，19世纪甚至更早期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曾积极努力地促进制造业和贸易的发展，具体体现在：设立法庭来确保贸易合约的履行并保护债权；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这对促进投资和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制定组织管理的法律模式；对铁路、运河和公路的修建提供补贴；用关税和配额来保护本国企业的产品免受进口商品的竞争，当然，这种做法对错难断；在许多国家中，政府也负责供给货币，作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尺度。除经济领域以外，政府在其他领域也有许多意义深远的作为，如义务教育的推行和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等。几个世纪以来，政府在不损及任何个人利益的情况下积极支持海洋运输业的发展，如修建灯塔、码头和防波堤，疏浚航道，进行安全检查，设置救护站，培训海员，设立航海医院等。政府通过授权垄断来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则更为久远；到18世纪末，对新的发明授予专利权已成为普遍的做法，甚至被写进了美国宪法。

尽管从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来看，经济领域常常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这种关系还包含着许多其他因素。政治领域最根本

的特征是对社会暴力的垄断性使用，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整套司法体系，确保以非暴力方式来解决经济领域的各种争端。这也意味着对私有产权的界定及保护，其中包括对政治剥夺和征税的限制。此外，在西方国家，为贸易活动提供货币媒介一直以来都是政府的特权。从本质上看，经济增长是社会变革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变革显然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它会很自然地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

总的来说，在西方经济增长的多数时期，促进制造业和贸易的发展对政府来说都至关重要。而在19世纪，政府却逆势而行，进行贸易管制、提高关税、管制价格和工资或消除个人收入差异。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能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支持和鼓励工业和商业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在一篇经济史论文中，强调不受政治影响的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并无不妥，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对经济领域的较少介入，使政治领导人得以把精力集中到政府管理的其他方面，从而促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昌明。这段时期的政治进步与经济进步一样，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民族国家得以统一；选举权范围得以扩大；民主和共和的政府取代了专制的君主政体；律师们致力于司法改革，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刑罚系统经过了彻底改造；公立学校开办了起来；国际关系大大改善，从1815年到1914年间，欧洲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事；自觉遵守法律成为更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对犯罪行为的防范也更为有效，因此，生命和财产变得更为安全。当然，这些进步离不开税收的支持，不过，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税收水平低得让人惊讶。高效政府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它无疑会有助于生命安全的保障和物质福利的增进。

组织管理

政治理论对经济组织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什么样的活动应该进行管理、对什么样的活动应该放任自流（即由个人自行决策）的问题上。从这种研究视角来看，军事、政治和一些宗教团体中使用的等级体系，是组织管理的唯一形式。经济学所使用的组织管理概念不同于此，内涵更为广泛，足以把一切经济活动都包括在内。而且在经济学中，组织管理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是否应对某种特定行为进行组织管理，而是如何对之进行组织管理。对那些除等级制

度外并不知晓其他组织管理模式的人来说，对这一差别作初步的解释也许是有必要的。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因此，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人们是在集体选择目标，市场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工作分配给每一个人，并对实现目标作出贡献的人给予回报。即便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任务，如为消费者提供早餐用的鸡蛋，也牵涉到一个由数以千计、散布于不同国家的个人组成的网络。虽然没有统一的等级体系把这几千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并与其他人配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它将实现共同目标的工作分配至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并为工作的完成提供必要的报偿和激励。若不是因为市场机制的这一功能，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不会如此有效。

在选择是以市场关系还是等级体系作为组织管理模式时，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从公司层面看（公司通常被视为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我们发现有些公司是按等级体系组织起来的，而有的公司不是。第二个层面涉及经济整体，在高于公司的层次上，经济可以按市场关系来组织，也可以按等级体系来组织，或者可以是两者的一种结合。公司的规模和形式多种多样，因此，等级模式和市场模式可能实现的结合形式，实际上是无限的。

强调市场主导的经济组织的效率，并非简单认为人为的管理工作越少越好。这种观点只是说，在有些情况下，由市场所引导的分工与合作，要比按照命令来组织的合作更有效。这是因为，在由市场引导的合作中，产出与参与者的愿望相一致，而且，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源投入能得到最大化的产出。另外，为证明市场模式的优越性而常常提到的一条理由是，市场机制下的奖惩比等级体系下的更为分明，力度也更大，因此在市场模式中，人们所感到的必须全力以赴的压力也更大。由此看来，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人为管理的多少。许多研究都表明，市场模式在组织管理方面更为有效也更为有力。

等级模式和市场模式并非是引导人们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仅有方法。庄园制度是经济组织的另一种模式。在封建制度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这一模式曾被广泛运用于农村经济的组织管理。与当今西方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一样，庄园制度既有等级体系的特征，又具备非等级体系的一些要素。在本书的第八章中，当

我们从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转向科学领域时，还会发现一种效率极高的组织管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关系，既非等级关系亦非市场关系。

如果人类社会的成员都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与世隔绝并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这样一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将会远远低于现实社会的生产水平。几乎所有的生产都依赖于协作，因此，不同社会的生产合作方式不同是对生产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最有效的解释。因此，要研究这些差异，我们首先要认识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并不唯一，这正是上文初步论述想要强调的。

西方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吗？

西方经济有一个很基本的特征，即在技术和各种各样的组织模式的尝试和选择方面始终持开放的态度。由此，如何命名这种经济成了一个问题。20世纪的做法是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统称为资本主义。尽管这一称谓已约定俗成，但事实是，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欧洲出现了一种以彻底的实用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经济制度，除经济效率和活力之外，这种经济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不信奉其他任何经济原则。这种促使西方经济增长的制度，发端于它被视为一种制度或一种意识形态之前。有关的经济理念和制度早已被普遍接受（例如私有制，不得无端没收财产和征税等），但它们并不以某种具体的经济制度体系或理念为基础。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的理论最早为自由竞争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但在那时，西方经济的一系列基本制度早已存在，经济增长也初具规模。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的头一二百年里，西方世界所持的经济理念，正是为亚当·斯密所激烈反对的重商主义。尽管马克思在1877年与别人的通信中的确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都没有用过这个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人是萨克雷，时间是1854年。而且，他在使用这个词时所指代的是拥有资本的状态。在杜埃1884年所写的一本名为《更美好的时光》的书中，这个词第一次被用来指代一种经济制度。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献中，“资本主义”成了他们要推翻的经济制度的一个蔑称。在最初创造并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的人们的观念中，这个概念并不用于理性辩护的目的。然而，西方经济的拥

护者发现这个词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就使他们放弃了决不应该使用对手对自己的称谓这一基本原则。

实际上，对于西方的经济制度来说，使用“混合经济”这一称谓可能更恰当。因为西方经济从来都是一种混合的经济。不过，使用“混合经济”似乎意味着早先曾有过一个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尽管相当勉强，我们仍将遵循传统，跟别人一样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它不是一个以“主义”为结尾的正式意识形态用语，而是一个方便的称谓，指的是西方世界在其数百年经济增长历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经济制度。

目 录

丨序	/V
丨第一章 导论	/1
丨第二章 起点：中世纪	/29
丨第三章 1750年以前的贸易发展	/56
丨第四章 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制度演进	/89
丨第五章 1750年至1880年的工业发展	/114
丨第六章 组织的多样化：公司	/150
丨第七章 技术、托拉斯和可交易股票	/167
丨第八章 科学与财富的联系	/191
丨第九章 企业的多样化	/213
丨第十章 暗示与比较	/238
丨致 谢	/265
丨注 释	/266
丨索 引	/301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第一章 导论

贫困的标准

回顾人类历史，如果要用现代标准去评价我们祖辈的经济生活，那几乎就是个无穷无尽的苦难故事。在当时的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人都在极端贫困中挣扎。文学、诗歌、传说以及神话所赞颂的都是富有的人，而遗忘了那些生活在贫困与苦难中的人们，也正因为此，我们很难了解那些时代的深重苦难。文学艺术将苦难处理成了神话，有时甚至将其粉饰成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与事实大相径庭。

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及地区才开始进入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才开始惠及 10% 以上的人口。为简便起见，尽管在地理上并不那么确切，我们还是把上述地区统称为西方。非常明显，到 19 世纪初，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的部分地区，人口中已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比古代中东、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和伊斯兰文明时期（也就是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饮食更好、更健康，生活也更安定（这种情况随后也出现在西方其他国家）。

从全社会的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就是物质富足程度的不断提高。当然，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等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这一进步。对人类来说，死亡从来都是最大的威胁，因此，由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首先要求远离死亡。衡量这个进步的主要指标包括平均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接下来是饥饿的问题。营养不良的改善及相关疾病发生率的下降，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方面。有关统计表明，瘟疫是人类早期苦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有致命或致残疾病的祸首。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内容。在很多时候，贫困常常与文盲、迷信、无知以及缺少见识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摆脱贫困通常也意味着向识字、接受教育和增长见识等方面转变。在贫困的生活中，活下去是首要甚至唯一

的目标。在那种生活状态下，住房极为拥挤，也毫无个人隐私可言，个人选择的空間极为有限。走向富裕也意味着享有更多的个人隐私和选择机会。

简单的统计数据不能完全反映社会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即使是最简单的经济，要对它所生产的无数产品和劳务进行最一般的统计，都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货币是衡量价值的通用尺度，不管其衡量的产品或服务在形式及内容上有着怎样的差别。这意味着，统计数据本身并不能反映出，经济增长是因为同类产品和服务的增加，还是源于改变了整个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的消费、工作以及生活的方式也都会发生变化。最初的变化或许小得可怜——饮食中增加几样蔬菜和一点肉，由穿木鞋改为穿皮鞋等，统计数据能比较清楚地反映这些变化。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童年时做工变为童年时上学；在庄园或农场劳作谋生变成在城市经商、在工厂工作或从事自由职业；住房也由乡间小屋换成了城市住宅或公寓。任何总量统计数据都不能具体反映出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不了 19 世纪的铁路和 20 世纪汽车的出现给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对个人而言，贫富差别主要在于钱财的多少，这种看法或许并没大错。但就整个社会而论，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例子来看，贫富差别不仅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更体现在富裕社会中的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造成统计数据缺陷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除非是生产可供出售的产品（如农产品），许多家庭劳动并不会带来货币收入。举例来说，当妇女从家务劳动转向有酬劳动时，根据 20 世纪的统计，妇女工资收入的计入会带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转变可能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商品和服务按市场交易价格计算货币价值，而另一些则根据税收或管制的情况来计算货币价值。由于换算方式不同，在衡量这两种交易所带来的物质福利时便缺乏统一标准。

一个值得我们考虑（至少是顺带考虑）的问题是，新增因素和既往存量对西方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相对大小如何。在通常情况下，西方经济每年的生产总值中约有 95% 来自年初就已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存量，只有 5% 或更少来自于当年新增的因素。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上述的相对关系几乎就颠倒过

来。在美国，经价格调整后的 1985 年的人均产值中，有 85% 以上得益于 1885 年以来的新增因素。

当然，这一数字还不是反映这个国家公民物质福利变化最完备的指标。但是，人们明显喜欢 1985 年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许除了十分富有的人以外，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就像数字指标所表明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但人们并未对此感到满足。事实上，容易自我满足的人能否由贫困发展到富裕，首先就令人怀疑。一般说来，身体健康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可能比因饥饿而麻木的人要更难应付。不过，尽管高度富裕的国家仍需依赖心理健康产业，并面临随个人选择扩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分歧，但人们对实现贫困到富裕的转变仍充满向往。社会变革本身就会带来一连串新问题，并取代那些老问题。相对而言，人们更喜欢研究富裕带来的问题而不是贫困造成的问题，这一点无可指责。

脱贫致富的故事中充满了各种传奇、神秘以及悲喜剧，这本身已值得我们去重述这一过程。当然，对于那些关心公共政策、西方经济制度相对重要性以及西方经济前途的人来说，理解西方经济富裕的原因非常重要。而且，这也能为我们的后代进一步改善生活环境提供更好的机会。

西方财富增长的渐进性

要解释西方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其最令人疑惑的方面开始，即西方经济增长的渐进性。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先进的西方国家完全摆脱了贫困而达到了相对富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经济产出并未发生过突变，而只是持续不断地、年复一年地增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英国和荷兰在更早时期就已开始了这样的增长。日本在 1868 年以后仿效西方工业化，也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即便如此，日本的成就也是通过渐进增长而获得的。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所有西方国家的人口与人均产出都实现了成倍增长。

在一年甚至十年中，剔除人口增长因素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显著。因此，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只有富人才能感受到经济的增长，而穷人大多体会不到。只是在西方

经济的增长持续到 20 世纪之后，才惠及了更多的人。显然，西方工人阶级生活越来越好，中产阶级也逐渐实现富裕，且占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但贫困并没有消失。西方的成就不在于彻底消除贫困，而是缩小贫困面。贫困人口的比例从 90% 降到 30%、20% 或更低。具体降到多低则因国而异，当然这也取决于人们对贫困的定义。随着经济的增长，贫困这一概念的内容似乎也有所变化。20 世纪西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拉大了富裕的西方国家与其他穷困国家之间的差距，但绝大多数世界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持续的增长过程中，一些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发明和革新（在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为人们所熟知。但这些重大革新并未改变经济增长在整体上的渐进性特征，统计数据显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尽管那些重大革新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相对集中（如工业革命），但它们直接影响的只是经济的一部分，其对全社会的影响往往要经历数十年时间方能逐步体现出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新知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累积性的，而大数定律又多少会把这一影响均衡地分布到不同的时间段。在历史上，不曾有过那样一天，甚至也不曾有过那样一个时代，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报纸编辑，会在新闻头条宣称某种经济或技术成就“将西方世界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很多经济和技术成就或许会在多年以后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一项成就能立即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提高，并由此终结由于战争、农业歉收、金融崩溃以及商业周期所造成的经济短期波动。

要解释如此长时期的渐进增长，需要在制度机制之中去寻找原因，这个机制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经济结构中，并不断筛选和实施能带来增长的各种变化。“深深”是关键的字眼，因为该机制是那样深藏而难以被察觉，以至于许多观察者认为，在经过长期的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之后，人类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将会不可避免。19 世纪的年均生产增长率一般是 3% 左右。在人类活动的大多数领域中，按 1.03 倍的几何级数递增的增长进程往往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远未达到 200 次递增就会逐渐趋弱。早在 18 世纪末，马尔萨斯就认为，由于食品供应的限制，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过程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¹，饥荒将不可避免。一个世纪之后，马尔萨斯的祖国英国，人口已翻了两番，但生活水平比他所处的时代高出许多。如果说马尔萨斯在两百年前不能预见到食品供给的持续增长，那么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新的马尔萨斯主义论者（这些人的逻辑推理方式与马尔萨斯相同，只是讨论的

对象是其他资源而不是粮食）会认为，西方的增长将难以持续。

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作出了影响广泛的“西方的衰落”的预言²。在斯宾格勒所处的年代，任何头脑清醒的预言家都无法预见，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人口翻了将近一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会增加2.5倍以上。这不只是因为斯宾格勒预言几何级数增长衰减的时机不对，更为重要的是，斯宾格勒这位识见深远的大思想家，也错看和低估了支持西方进步的力量，同时也错看和高估了侵蚀西方发展的负面因素。在那个时代，斯宾格勒绝对不是唯一持有如此见解的人。

我们将看到，西方已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一项创造和发明产生后的数十年中仍能不断带来经济增长以及物质福利的大幅提升。这种制度惯性，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人们在这些制度中工作，并促成了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多时候，虽然鼓励创造性工作的激励已经消散了很长时间，但人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工作。此时，推动制度运转的动力源于人们的习惯，以及除此之外人们也没有更好选择的事实。由于原因与结果往往会间隔许多年，这种制度的衰落会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以至于当其衰落显现时，事情已经到了无可逆转的地步。的确，在一些足以引发崩溃的事件之后，社会制度往往还能延续很长时间。罗马帝国的经历可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足以导致罗马帝国最终崩溃的事件发生之后，它仍继续发展了一个多世纪。

在评价西方增长的各种可能解释时，需要记住一点，即因与果之间往往存在漫长和不确定的时间间距。许多西方制度在促进增长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社会潮流，它们或许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即便如此，西方经济增长仍在继续，甚至有理由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都没有恶化之虞。因此，在用这些已发生变化的制度来解释西方的增长时必须加倍小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忽视这些制度。相对近期的制度性变化的影响也许尚不明显，或许如果没有变化，经济增长率还会更高。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复杂难辨，比如，人类行为及制度对变革的适应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可能会有不同；由于制度的惯性，在制度引发的繁荣被人们遗忘时，它对经济仍在起着作用。必须承认，面对如此复杂的关联，由于无法使用受控试验的方法，经济史研究

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确定性结论。

以前的一些解释

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西方从贫困变为富裕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里，我们先对以往研究得出的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解释作一个简单概括。

1. 科学和发明

对于西方繁荣的原因，最主流的解释是强调科学和发明的重要性。不过，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仅靠科学和发明就足以让一个国家富裕，那么，为什么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没有率先摆脱贫困实现富裕呢？在西方从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时期，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科学和发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对这个解释还存在另一个疑问：按通常的理解，科学和发明都属于知识范畴，通过书籍和讲授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将这些知识从一个社会传递给另一社会。但事实证明，将经济增长的钥匙传递给落后国家，比传授科学知识困难得多。在这里，我们无意否认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它显然不是西方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

2. 自然资源

另一个常被提到的西方经济增长的解释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自然资源或者它们能以非常有利的条件获得自然资源。例如，马克思就认为，西方从16世纪开始的帝国主义征服以及从海外获取原材料的做法，为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增长。相似的，在19世纪末，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帝国主义支持者也都强调自然资源的重要性。而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极限的论著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精巧的资源的概念，并相信自然资源的占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简单直接的联系。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地国家和瑞士的繁荣让这种解释有点不能自圆其说。近代以来，日本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则彻底推翻了这种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身自然资源有限而且失去殖民地的西方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却深陷贫困的泥潭。总之，以自然资源为理由的解释与事实不尽相符。

最后，基于自然资源的解释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经济资源不仅包